

秋分

讀享·九州

讀享 
JIUZHOU PRESS

精彩看点

卷首语：
秋分之后，方得秋美

余世存：
三观尽毁
是时代精
神的隐喻

身生活和心生活

好莱坞大片视角下的
滇缅战场

书写乱世英雄评传
还原明代抗倭历史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林语堂与鲁迅

何为谋生之道

目 录

1 / 卷首语：秋分之后，方得秋美

4 / 余世存：三观尽毁是时代精神的隐喻

16/ 身生活和心生活

21/ 好莱坞大片视角下的滇缅战场

35/ 书写乱世英雄评传，还原明代抗倭历史

45/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52/ 林语堂与鲁迅

69/ 何为谋生之道

| 卷首语 |

秋分之后,方得秋美

今日秋分。分者，平也。秋分即为将秋季一分为二。

按《春秋繁露·阴阳出入上下篇》云：“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今日昼夜均长，温凉相宜。

地域辽阔，南北知秋皆有晚早之分。自秋分时起，南方也正式入秋。而北方即进入大美之秋的后半程。

世间美景多自苦寒，一如层林尽染于寒霜而降。人生又有何异呢？

陈寅恪的一生也分前后，如果定要如此划分的话。而彰显其高贵和品质的恰恰在于其多舛的后半段。

他的弟子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蒋天枢的弟子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

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

秋季大美,美在收获。

收获在心,更为珍贵。一如克里希那穆提的开悟语录一般。“你和我才是问题,而不是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只是我们自身的投射物,想要了解世界,我们就必须先要了解我们自己。世界不是脱离我们而存在的,我们就是世界,我们的问题便是世界的问题。”生活的难题,不在于外物,而在于己。

懂得了这一点,就会明晰大美不言,秋分更近的涵义所指了……



《读·享|九州》编辑部

2015年9月23日



余世存：三观尽毁是时代精神的隐喻

三观尽毁、节操碎尽是时代精神的隐喻。公知被妖魔化与回避民族身份认同有关。当救亡不再压倒启蒙,是时候思考精神问题了……

[摘要]三观尽毁、节操碎尽是时代精神的隐喻。公知被妖魔化与回避民族身份认同有关。当救亡不再压倒启蒙,是时候思考精神问题了。

编

者按2014年9月5日,著名作家余世存携新书《人间世》与一众老友用关键词的方式探寻当下的时代精神。毛喻原认为,时代精神的特征是乱码。黄秀丽则认为是迷茫与厌倦。余世存认为,三观尽毁、节操碎尽是时代精神的隐喻,公知被妖魔化与回避民族身份认同有关。十年砍柴认为,当救亡不再压倒启蒙,是时候思考精神问题了。以下为学者对话实录:



(黄秀丽和毛喻原发言)

王俊秀:这个时代精神的关键词是什么?

毛喻原：乱码，一批乱了码的文本没法阅读，更没法阐释。余世存还可以说，有兴趣说。我们是乱码文本，说什么？这个国度太特殊了，特异性、怪异性超过你的想象，无法描述，所以让我总结关键词，可能是“乱码”。

十年砍柴：向下，还有是拥抱庸俗。像我自己，人过了40了，大家都这样。鲁迅也曾批判过，过了40都这样，中年人的面目，按照世俗的指标去评价什么是成功，所以我是拥抱庸俗，上上微博，看看孩子幼儿园的APP，看看小孩子干什么，就变成这样了。

黄秀丽：我认为是迷茫，也可以叫厌倦。20世纪八九十年代觉得很有精气神，1998年我刚刚做记者也有精气神，觉得这个国度可以改变，可以变得民主、自由，慢慢发现可能性不大了。大家都混小圈子，还能把自己个体的生活维持得比较美好就不错了。

毛喻原说西方人是天上的，这个启蒙很棒，但最近几十年他们也在拼命地往下。我最近编了一本书，讲的是互联网文化，美国、加拿大、英国的互联网文化非常可怕，把很私密的事讲上去，为了很多粉丝，24小时直播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实在太无聊了。中国有一个好处是世俗化，是往下的东西，学西方往上飞，但飞不上去，要和地下结合，说不定能走出一条路，也许还有一点光亮。



(余世存)

三观尽毁是时代精神的隐喻

余世存：我不从自己的角度，引用年轻人的一句话评述这个时代的精神关键词，就是“三观尽毁，节操碎了一地。”这个话非常精准，某种意义上跟毛喻原和十年砍柴说的异曲同工，但这个话说得挺狠。之前以为是初中生、高中生骂的一句话，或者彼此之间开玩笑说的一句话。但童谣也好、青少年流行句也好，一句话竟然这么精准地命名了这个时代。要知道，在中国传统上，童谣一般是有寓意的，有巨大的隐喻，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的隐喻就是那句话：三观尽毁。

你可以看成是中學生彼此間的玩笑，也可以看成紅十字會、郭美美、柯震東，還可以看成是吳思命名的官家主義。就連我書中寫的知识界的爆發戶、文化界的问题，也是三官尽毁，没有例外。所以毛喻原说的话我是同意的，这个时代要关注精神、谈论精神，真是二三人之间的事，非常私密，超过这个圈子流行开来，那肯定是有问题的，是很悲哀的一件事。

我们所能做的是，在三观尽毁的时代，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份超然，用我的话是公民人格、公民社会，中间结构应该给人一种信任的东西。也许大家在生活中感觉到压抑时，看官场谈论、企业家的口水或者文化人的小情调还是无法排解的时候，我希望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存在一些精神性的元素，能够给你们信任，能够让你们看到汉语世界仍然有它的东西，不管是安

全网还是保护网，能够给你一种心灵层面的安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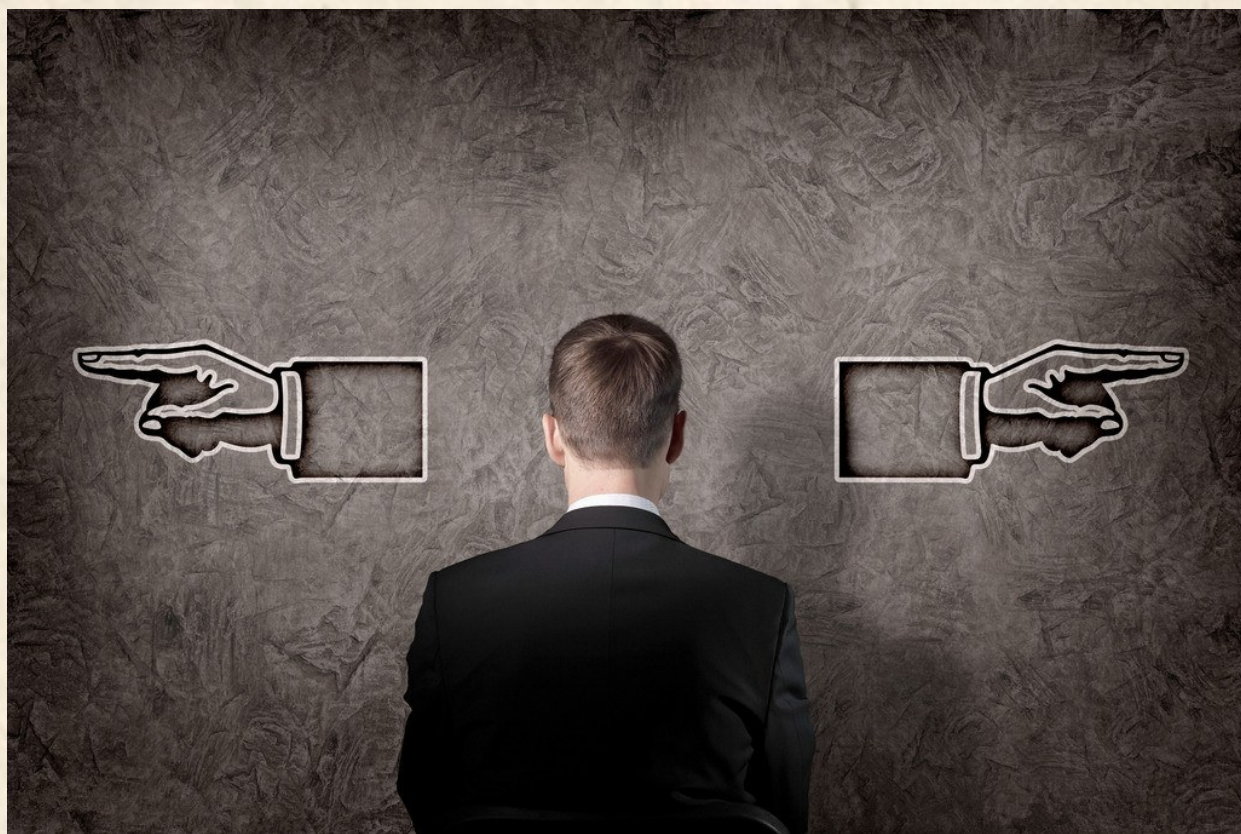
公知被妖魔化与回避民族身份认同有关



第二个层面，为什么社会到了这个程度？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人士，是怎么把社会带到这个层面的？对最近十年的观察会很有意思。2003年曾被很多人称为中国的权利元年，因为那年的孙志刚事件，中国收容制度得到律师界的批评，我的很多朋友参与到维权中。那一年是中国风起云涌的权利元年，发现了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

有意思的是，2004年发生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当年11月我写了一篇文章《老调子没有唱完》，从张艺

谋电影《英雄》的推出，到《甲申文化宣言》，王蒙、任继愈突然抛出《甲申文化宣言》，说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向西方学得太多、走得太快，要找回自己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而且说中国文化如何如何牛。所以我说老调子没有唱完，突然在中国人争取权利的时候，有了这么一个上下层面呼应的转向。我那篇文章是一个预言，这十年在往那个方向转。到今天传统文化产业、国学已经成为时髦的词语，维权分子几乎成了丧家狗，连小区里见了维权人都躲着走。



一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用东西方文化的词语，有三大任务——民族、民生、民权。2002年、2003年的时候，是中国人的民生问题基本得到了解决，向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迈进。所以那一年民权问题高涨，中国人权利意识起来，这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但很可惜，政府也好或者这个社会的另外一批人也好，

他把我们社会转型的轨道强行地拐到民族身份认同上。而自由主义或者持宪政主义的知识人也好,对民族身份认同没有顾虑,只顾民权往前走,没有想到民族身份认同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应该回答的问题。

“公知”最近十年的被妖魔化、污名化,跟他们自身在这个问题上的回避有关系,因为他们回避了民族身份认同问题,回避了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形象和人格精气神问题。所以在左边力量挤压之下,他们被淡化,被边缘化。虽然社会言论空间是如此地窄,这是很可惜的,但也没有关系,只要中间有人意识到了就可以做这个工作,还有希望。

十年砍柴:刚才说三观尽毁,我突然想起了一个对子,四维不张。中国古代看社会道德沦丧时,总是说“四维不张,国之将亡”。我对余世存的判断很认同,为什么2004年当有关部门意识到以后,能用民族主义的东西来打压民权的东西?这是非常巧妙的,现在事后诸葛亮可以总结一下。当时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公民权利时,也没读过多少书,说《二十四史书》全是黑暗的。我把自己也列为自由主义者的光谱,但对传统是尊重的,我说《二十四史》你读完了了?你读完前面几史也不错了,他很生气。我要维护公民权利的时候,就要把传统文化给打倒,这是不对的,是先天性的缺陷,所以有关部门很巧妙,突然提出民族主义的东西,把舆论倒向给搅过去了。

当救亡不再压倒启蒙 该思考精神问题



（青年学子朗诵《人间世》）

回到今天的问题，今天跟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不一样，跟21世纪初不一样，用官方的话是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迈入小康。中国以前引起社会动乱、引起社会分层剧烈的原因是，生存问题没有解决，大部分老百姓吃不上饱饭，那时候讲文化、讲精神是没有用的。

以前的士大夫会殉道，代价非常大，特别是明末的知识分子。

到今天现代科技、市场经济、WTO、世界经济一体化给中国带来了福气，中国老百姓可能为了拆迁上访，但中国13亿人温饱问题解决了，而且我们看到身边所接触的，无论干哪行哪业的，比我们的老祖先要好很多，这时候应该看精神问题了，但我们还是在向下。这是我们面临跟以往不一样的命题。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主题没有了，先解决吃饭的问题再解决精神层面的问题也没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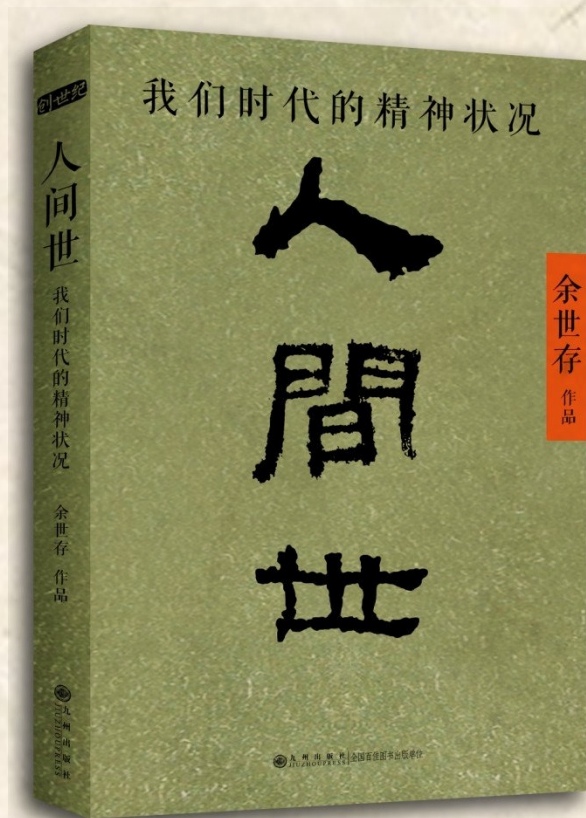
这时候我们没有一些知识分子站出来写出一些超越自己立场的书，这时候进入市场就有两种。一种是《小时代》这样的东西充斥着，它吸金，大家把它包装。另外是我们看到的微博上各个阶层上的大V，微博跟BBS不一样，BBS是思考者的园地，微博是各个行当的，做买卖的、做房地产的或者官员都是表演，这些个大V发什么微博就知道。

大家已经吃饱饭了，是第二世界经济体，每天给世界所提供的还是《小苹果》、《最炫民族风》？大妈曲占领世界确实可怕。民生问题基本解决后，转换到民权时，被人为地异化或者包装的民族主义给打断了。中国人需要找出自己的民族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气，民气是什么样的，这个族群是什么样的人，这终究是要找回的。当我们成为第二经济体，连进城的泥瓦工已经不是那么可怜，已经在老家盖三层别墅了，这时候让90后看《小时代》，太对不起列祖列宗了。

相关图书:《人间世:我们时代的精神状况》

余世存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简介:

这是一本有趣的人情世象笔记,也是试图对世道人心做出“总体性解释”的观察思考,其中既有时代社会最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命题,又有日常生活最细小的饮食男女话题,是汉语对精神的关注、抵达和成全,是精神对庸常的安顿、命名和超越。作者主持当代汉语贡献奖十年之久,在这个浮华的时代,作者的关怀和用心值得注意。读本书可知在社会百态的生存中坚实立足,知道我们的方向和位置,知道人生诸种可能中的精神成就。

“讀·享·團” 简介：



“读·享·团”是九州出版社主办的官方读书会,以好书分享为主旨,邀请学者、名家进行读书沙龙讲座为主要活动形式,介绍好书,交流思想,倡导独立思考,不定期举办。我们会将最新活动通知,活动现场文字、图片、视频资料通过邮件的形式与会员分享,并会有不定期赠书活动。享受阅读、分享智慧,扫描二维码,一起加入九州读书会吧!



身生活和心生活

◎ 钱 穆

人生,可分为“身”“心”两部分。虽则身生活必兼心生活,心生活亦必兼身生活,但仍不妨分别论之,可更易明人类生活之真相……



人生，可分为“身”“心”两部分。虽则身生活必兼心生活，心生活亦必兼身生活，但仍不妨分别论之，可更易明人类生活之真相。

《吕氏春秋》载一故事，师徒两人薄暮进城，适城门已闭，不得已露宿郊野。遇大雪，甚寒。其师云：“今夜雪，盛寒深，我两人势难幸免。不如合两人衣穿一人身，此一人或可勉强度过此夜。我方传道救世，不宜死，汝当解衣衣我。”其徒说：“我随师方浅，尚未能传师道。师欲传道，当先救我一死。”其师无奈何，乃解衣与徒。

当此两人一番商议讨论之际，同样有其心生活。惟其徒心中，惟知己身生死，视其师赤身毙雪中，漠然曾不动其心。故此徒乃以身生活为主，心生活为奴，即古人所谓“以心为形役”。而其师心中所考虑，则不专萦怀在己身上。明知两人不得同生，乃舍己救人，此即其心生活能超于身生活之外之证。



身生活与心生活，虽同属人生之一面，然二者间性质甚不同。有关身生活者，多互相排拒。如一碟饭，饱我之腹，即不能同时饱人腹；一杯水，解我之渴，即不能同时解人渴。一件衣，暖了我体，即不能同时暖人体。凡属物质方面，莫不如此。

故惟知关心身生活者，其心灵必狭小多私。又且声色、臭味、体肤、口腹切身之欲，只一人自知，一人受用。又多是取之人而供之己，乃是以人之失为己之得，故同时易起争夺心。

有关心生活者，如情感、如思想，皆可与人共之。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一人喜乐，满室为之开颜。与人以同情，在人得安慰，在己无损失。凡自己有一套思想、知识、信仰、理论，总喜欢公之人人以为快。



《老子》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所以心生活之内容，可以取之人而于人无损，可以公之人而于己益多。其心情可以日趋广大，其境界可以日趋开明。可以无我无人，古今中外无阻隔而融通为一，则只有在心生活方面。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中央日报》）

本文选摘自《人生十论》（精装简体版）

钱穆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简介：

本书系钱穆先生所撰有关人生问题之文稿汇集。钱穆先生从中国旧传统、旧观念归纳人生义理，紧随时代新潮流、新趋势，阐发了人生立身处世之要旨。书中“人生目的和自由”“如何解脱人生之苦痛”“中国人生哲学”“谈谈人生”等文章，对读者形成正确的人生观有着莫大的启发意义。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滇緬公路上人們在拉拽墜入河溝的車輛）

好萊塢大片視角下的滇緬戰場 ——《滇緬公路》、史迪威與血雨蒸騰的中美臍帶

◎ 鄭闖琦

這是一條有悲劇性格的英雄之路，它在日軍的槍炮襲擊下、在爛泥與疟疾流行中延伸 1100 英里，幾乎每一英里都倒下一個盟軍士兵……

这

是一条有悲剧性格的英雄之路，它在日军的枪炮袭击下、在烂泥与疟疾流行中延伸1100英里，几乎每一英里都倒下一个盟军士兵；但“甚至在它刚刚完工之际，就将被视为过时的废物而遭到无情地丢弃”。它所象征的二战中国—缅甸—印度战场，以及这个战场的总指挥史迪威将军和中国数十万远征军将士，也如同目前荒凉的滇缅公路，被历史的荒草一层一层淹没。



（1944年7月15日在沿列多公路某处的康复营地，史迪威将军脱帽对着一群中国退伍军人讲话。）

二战中，中缅印战场是最不被盟军重视的战场，也是最容易被西方世界遗忘的战场。盟军的物资、兵力都优先欧洲，而中缅印战场则位列最末，这从开始时罗斯福总统只给这个战场派一个光杆司令史迪威将军，

就可以看出来。

史迪威身为驻华美军司令、中印缅战区司令，却几乎没有自己的军队，只是到了1944年，才算有了唯一一支美国军队——不倒三千人的5307混合支队（招募自中美洲等地的美国志愿军）。罗斯福让性格乖僻的史迪威指挥蒋介石视为性命的嫡系远征军，这成为两人无法化解的矛盾。日本占领缅甸后，为了修筑中国唯一的国际援助通道滇缅公路，史迪威领导中国军民、美国工程兵浴血奋战，当公路建成之际，却也到了日本败退之时，这条公路被一些人批评为一个巨大、艰苦卓绝但又没有用处的浪费工程。



（修筑滇缅公路的华侨）

战后，在西方人的二战史叙述中，诺曼底登陆、太平洋美日海战等才是绝对的主角，而为了把中国留在抗日阵营的中缅印战场，则比中国抗战的重要性还要

低。在中国，抗战的主角也自然是七七事变、淞沪会战、百团大战等国内事件，中缅印战场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与关注度也就难以提高。

然而，美国《国家地理》资深撰稿人多诺万·韦伯斯特的《滇缅公路》一书，则以好莱坞大片一般的视角，为我们再现了桀骜不驯的英雄加上若干个《兄弟连》、史泰龙系列电影一般组成的中缅印对日作战历程。

作者以画面感十足的文字，让人时刻能感到缅甸雨季蒸腾的热浪、没膝的淤泥和硬汉满脸的血污，而史迪威、盖瑞特“亲迪部队”、“野牛比尔”101特遣队、“梅里尔掠夺者”部队、北部克钦联军（以杀敌割耳著称）等性格各异的英雄群像，在此环境下也都令人印象深刻地从字里行间来到读者面前。这些硬汉和英雄，哪怕知道自己在盟军视野中处于一个偏远角落，人员、武器和物资也都最少，但面对的敌人、丛林湿热的环境却比其他战场的盟军更险恶，但他们依然怀着满腹的怨愤、军人荣誉以及争功好胜的天性，深入敌后，以一当十，勇敢杀敌，死而后已，留下了一个个荡气回肠的人生传奇。



（二战时，滇缅公路上的中国远征军部队）

史迪威，这个满怀青史留名壮志的军校教师除了指挥过一些演习之外，别无成就，已经在做退役的准备。然而，随着他的老领导马歇尔晋升上将，他的人生迎来了逆转。1942年，他带着病痛的身体，壮心不已地奔赴中缅印战场，打算建立自己的不朽功业。

然而，当他刚到达缅甸，就发现数万英军和他统领的十万中国远征军已经被日军包围，中缅之间的通道已经被日军切断。他的第一个重大的使命居然是协同英军统帅——几个月前曾经成功指挥过盟军敦刻尔克大撤退的亚历山大将军如何成功地逃离日军的重围。他让手下尽可能地坐飞机撤离，而自己与80余名下属与残兵则选择步行穿越缅甸的丛林。（此次撤退中，中国远征军除孙立人师等数千人外，其余皆拒绝史迪威撤往印度的命令，翻阅野人山回国，三万多将士死于途

中，仅存三千余人。)



(史迪威)

此后，史迪威虽然提交了一份详细的作战计划，但却得不到任何回复，坐了18个月的性情躁郁的冷板凳。他患上了黄疸病，与打算坐等美国打败日军的蒋介石斗争，与飞虎队名将陈纳德竞争各自的战果、援助物资和在新闻界的声誉，他看不惯英国统帅蒙巴顿勋爵处处摆谱的官老爷排场，用“花生米”来称呼剃光头的中国领袖蒋介石，直至蒋要把他赶回美国去。



（蒋介石夫妇和史迪威）

在反攻日军的日子里，史迪威兴奋不已，他仍然“坚守在前线附近，睡在一张帆布床上，用钢盔盛水洗澡，清理他自己的武器，每日更步行若干英里，去鼓舞他的前方部队进攻”。但他的肝病已经很严重，他吃得比鸟还少，“面色苍灰而疲惫，脸孔上沟壑纵横；他的衣服就好像挂在身上”。当缅甸全胜已经指日可待的时候，史迪威和蒋介石的矛盾已经到了“生死对决”的地步，而盟军最终则认为史迪威在那里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因此替换了他的职务。1946年10月，罹患肝癌的史迪威在家中去世。充满他生命苦痛与辉煌的滇缅公路，建成后也被命名为“史迪威公路”。



（中国车队从缅甸开过史迪威公路，1945年2月2日中美车队的卡车司机在驶出密支那时，向一位缅甸母亲和她的孩子致敬。）

只有三个营的5307混合支队，是唯一一支正式在亚洲土地上战斗的美国军队，穿插敌后数百公里，在热带丛林间战斗，他们正是此后美国特种部队的前身。在配合中国远征军的反攻作战中，这支部队的“橙色战斗队”以250人对阵日军5000人的进攻，他们以牺牲8人的代价，却打死了800名日军士兵，但此后

的行军中，却因为疟疾等热带疾病而死去了109名士兵。在一次被日军围困了13天的防守战中，“每个人都病弱不堪，饥渴难熬，面容不整，筋疲力尽。因为他们喝大象打滚的泥塘和象足印中的污水解渴，几乎所有的‘掠夺者’士兵都染上痢疾，许多人将他们裤子的裆部剪掉，这样当他们腹泻的时候就听其自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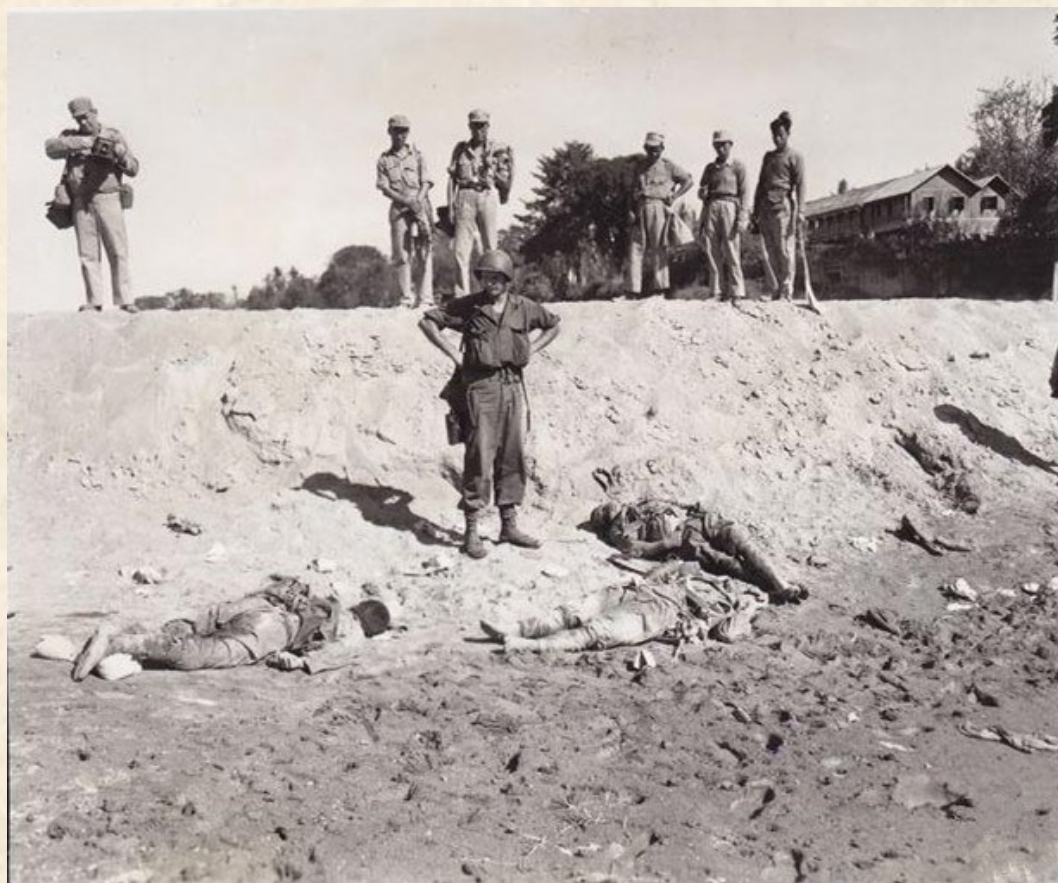
（1945年2月15日在缅甸腊戍以北55英里处，第2炮兵连的一门155毫米榴弹炮陷入溪流，找来一台卡车拖拽。）

最终，在友军的增援下，他们牺牲49人，但发现了400多具日军的尸体。在这支部队中，还配有不少日裔美国人。他们翻译日军的冲锋口令和文件、抵近偷听日军的对话，以行动证明了自己对美国的忠诚，虽然两年前他还被视为可能的间谍，同十余万日裔美国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

除了5307支队，英国将军温盖特率领的“亲迪部

队”、V 部队、克钦联军以及 101 特遣队也都在敌后渗透行动中屡建奇功。他们的共同特点都是以小股精锐丛林部队单独深入敌后进行骚扰、破坏和袭击，虽然也曾经遭遇过重大损失，但总的来说都以少胜多，打击了日军。如骁勇善战的克钦部落军队往往利用狩猎技巧以陷阱杀伤日军，并割下日军的耳朵向盟军领赏，对日军造成了很大的心理恐慌。

这些西部硬汉、悲剧英雄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顽强地打击着日军的战线，他们和中国远征军、英军一起，除了开通和保卫通往中国的驼峰生命线以外，本身就构成了中国与盟军之间的生命和精神脐带，共同构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宏伟史诗。没有中缅印战场的中国抗战是不可设想的，没有中国军民拖住一百多万日军的美日太平洋战场也是不可想象的。



(拍摄于被中国第三十八军从日军手中拿下二十四小时后的缅甸巴莫，日军尸体和废墟一目了然，1944年12月16日。)

除了精彩的还原历史之外，本书也对这段历史有着自己的一些独到的看法。作者认为陈纳德过分夸大空军的作用，“陈纳德宣称——以他的‘专业视点’，动用105架先进的战斗机，加上30架中型与12架重型轰炸机，他统率的中国航空特遣队就能够‘完成让日本灭亡的使命……或许在六个月之内，最多也不会超过一年的时间。’”这个设想虽然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但最终被证明是不切实际的。

对于1944年中国战场的豫湘桂大溃败，作者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蒋介石担心部下造反，因此不愿意给军队装备美国的军事装备，最终反而导致大量的装备被迫被炸毁或陷于敌手。在衡阳保卫战前，史迪威“将1.2万吨的枪支和弹药，通过驼峰航线送到薛岳及其部下的手上。然而，当这些武器抵达昆明之后，却再也没有能在衡阳露面。这大约又一次印证了蒋介石的个人偏好：绝不武装他麾下最能干的将军们，以免他们反戈一击。”最终，“在战场的最前线，这支部队所能获得的炮火支持仅仅来自两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75毫米加农炮，而用以向敌方发射的炮弹不过区区两百枚而已。”

在桂林守卫战中，一方面，“一支防卫桂林的部队——约有1.4万人——仅有两千支勉强能用的步枪，但是用来发射的子弹却少得可怜。”而且，这些士兵的武器有的是老式的中国造步枪，有的是俄国枪，还有的是战前日本造的老炮。都没有足够的弹药。另一方面，美国战略情报局下属的一个在小分队，却在柳

州的土山发现了“三个巨大的弹药库，每一个弹药库都有二十到三十间库房，贮存着总计约五万吨的子弹以及五十余尊崭新的大炮，数万发炮弹，各种类型的枪械武器以及——最合格里森胃口的——二十吨炸药。由于中国军队已经一溃千里，中国东部的危机又迫在眉睫，他们已经没有时间分发这一数量庞大的军火藏货，格里森被迫要将它们全部炸毁。”



（轰炸腾冲后返航的美军第14航空队B-25轰炸机。
机腹下为浓烟滚滚的腾冲城）

随着长沙、衡阳、柳州等战略要地的失陷，陈纳德不得不炸掉多处机场、跑道和军火仓库。当时，陈纳德指挥的第14航空队已经拥有大量先进的飞机，按照军事学者徐焰的说法，已经取得了对日的制空权，如果蒋介石能如实把美国的军事装备配备给军队，将不会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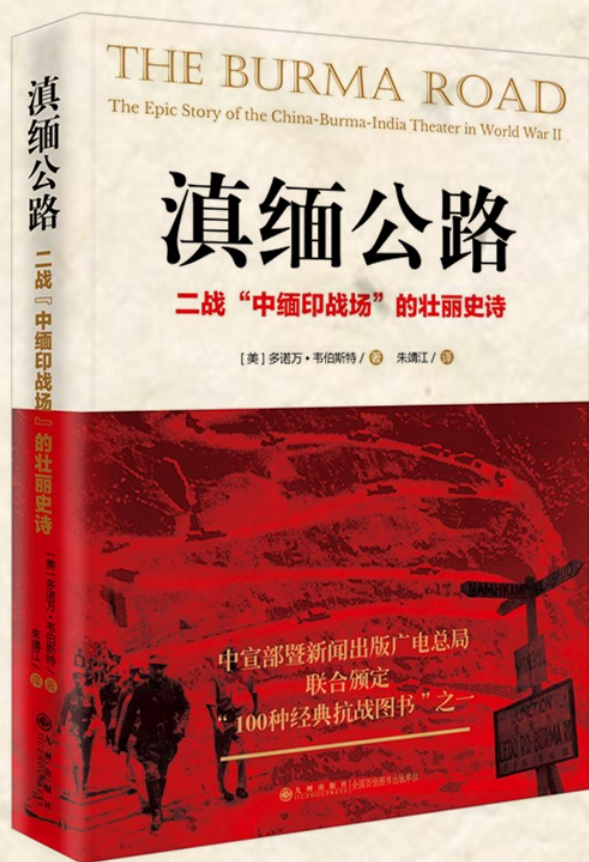
致这次举世震惊的大溃败，从而也不会有罗斯福牺牲外蒙古和东北来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的雅尔塔密约。

另外，有时候优点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也是其缺点。本书最大的特点在于对小规模特种部队作战的传神叙述，但因此也对进行主力作战的十万中国远征军、对英国数万正规军作战状况写得不成比例的少，通常只是概略叙述。这就造成了似乎中缅印战场只是这些人数很少的特种作战部队在进行的感觉。也许作者认为对大军团作战的记述有军史等专门的著述，而不用在本书中多写吧。

相关图书：《滇缅公路：二战“中缅印”战场的壮丽史诗》

[美]多诺万·韦伯斯特 著

朱靖江 译



简介：

滇缅公路，这是一方曾被遗忘的丛林战场，曾经书写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缅、印、英、美等国人民共同付出鲜血与泪水的悲壮故事。矢志于为湮灭的历史拂去尘土，让更多的人记住这片土地，2002年11月，受美国《国家地理》杂志的委托，资深撰稿人多诺万·韦伯斯特从印度加尔各答启程，穿越缅甸境内的热带丛林，再度踏上这条早已荒芜，却是在二战期间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公路。本书译者朱靖江亦应《国家地理》之邀，陪同韦伯斯特共同探访这条战时公路在中国境内的路段。通过沿途极为艰苦的实地考察，多方探访当年的老兵以及修路者，韦伯斯特获取了大量第一手材料，写就了这部非同凡响的史诗故事。



南北少林武术交流（林水坤摄）

书写乱世英雄评传 还原明代抗倭历史

——曾纪鑫《大晚雄风·俞大猷传》简论

◎ 李 钧

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个“说不完的明史”现象。如果说中国汉唐史气质阳刚、气势恢弘，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充满文化自豪感……



在中国历史研究领域，有一个“说不完的明史”现象。如果说中国汉唐史气质阳刚、气势恢弘，令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充满文化自豪感，那么相比之下，有明一代作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则精神阴柔、历史晦暗，令人内心纠结、无限怅惘，产生一种“丰富的痛苦”：明代最讲纲纪王法，却多有暴君昏君，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如仇雠；明代重视儒学理学，却文字狱盛行，新“焚书”学案不断；明代腐儒盛行，伪道欺世，有文治而少武功，讲“道德”而无法治；明代崇文有余，武功废弛，故其“文”就显得纤弱柔媚，其“雅”就有些精巧无用。尤其是明朝中晚期，西北有胡虏，东南有倭寇，内地有动乱，怎一个“乱”字了得……

所以，研读明史，使人对于历史真假、国家治乱、人事兴替等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甚至让人有心乱如麻之感。但是，明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留下

了太多存废治乱的教训，故而“别有怀抱者”反而乐于深研细究，力图把这团乱麻理出个头绪来，给今人后世存一面镜鉴，张学良、吴晗、朱东润、孟森、黄仁宇、高阳等概莫如此。

曾纪鑫似乎对明史也特别感兴趣。他2006年出版的文化历史散文集《历史的刀锋》选取了11个中国历史人物，其中就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明末大将吴三桂；2011年出版的《一个人能够走多远》，其中《英雄的出路与末路》写李自成起义的原因与始末；2012年出版的《晚明风骨：袁宏道传》，写“三袁”为代表的晚明文人情怀……目前，曾纪鑫正在书写系列文化历史散文“影响中国的11个闽南人”，其中就有6位明代人物：俞大猷、李贽、黄道周、洪承畴、郑成功、施琅（后4位属明末清初）。

在曾纪鑫的“闽南人物”系列中，他较早完成的是《俞大猷：不该忽视的抗倭名将》。因为这篇文章，他受到泉州俞氏宗亲协会邀请，参加了俞大猷诞生510周年学术论坛；随后，该宗亲协会又热忱约请他创作一部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大明雄风·俞大猷传》（以下简称《俞大猷传》）。曾纪鑫知道，这是一个大难题：首先，明朝那些事儿，史料庞杂。无论官史还是稗史，可谓斩不断、理还乱，难以正本清源。其次，明末诸人毁誉参半。对正德、嘉靖、万历皇帝固然众说纷纭，对严嵩、张居正、徐阶、高拱、谭纶、海瑞、戚继光、郑和等人的看法也莫衷一是。第三，俞大猷备受争议。一方面史料博杂，另一方面一些偏见已成，要想拨乱反正，“还原历

史，回归真相”，无异于以一敌众，自树标靶……但是，曾纪鑫思虑再三，还是接下了这个任务，因为“俞大猷集道德、事功、文章于一身的‘三不朽’境界，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也一直吸引、感染着我”（《俞大猷传》后记）。的确，俞大猷的遭逢际遇、人格风度，对今天的人们仍大有启示价值。



（俞大猷塑像）

英雄不问出处，常起于微末，却往往因为具有“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进取精神和牺牲精神，终成一段传奇。俞大猷生平无疑具有“英雄传奇”的所有要素：他世袭末级武官百户长，文秀才，武进士，文才出众，武敌百人，有战略思维，能率百万之师；他生年76岁，戎马生涯47年，东南抗倭，西北驱虏，内地平暴，是难得的忠义之臣；他“坚持谋定而后动，计定而后战，不

肯轻易出击，对瞎指挥有着一种本能而强烈的抵抗意识；加之为人正直，不愿委曲求全、巴结上司，不居功，不谄过，常遭攻诘，蒙受难以预料的灾祸。他不抱怨，不颓废，总在逆境中奋起，往往撤职不久，就因大胜而撤销处分，并受擢拔。

他一生四为参将，六为总兵，有过七次受辱，四次贬官夺荫，一次逮捕下狱的坎坷经历”，可谓大起大伏；直到71岁时，他还被夺去正一品官职，幸有兵部尚书谭纶保护，到北京训练车阵，才重获右军都督府佥书管事，练兵3年后，于万历六年（1578年）回到故乡泉州，“完名全节”，可谓宠辱不惊，的确一代儒将。正如万历皇帝准其回乡的圣旨所说：“才猷兼茂，忠赤独怀。历仕三朝，身经百战。经营四十七年，斩馘二万五千余级。功在边陲，裒然为诸将之首。况操履清素，始终不渝，又有足称者。”《三国演义》作者借曹操之口说：“夫英雄者，胸怀大志，腹有良谋，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就此而论，俞大猷是一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一个无私无畏的大英雄。我想，《俞大猷传》之所以没有在结构和叙事技巧上做过多设计，而是话说从头、顺流而下，就是因为传主一生已经足够曲折，比戏剧更具有戏剧性。



这部历史人物传记就是一面镜子，不仅刻画出了传主的形象气质，更让人看到他所处时代的社会风貌。俞大猷一生功业主要在抗倭，而《俞大猷传》的可贵之处在于能够“前提追问”，揭出倭寇成灾的原因。我试将其归纳为如下三点：

一是闭关锁国。明代施行陆防海禁政策，与倭蛮互不通贡，这就无法满足国民生存和经济发展需要，无法适应新的生产力要求；陆防海禁消耗巨大人力物力，既不利于开源节流，更滋生了外患侵扰。

二是兵燹不断。外患入侵，故军费大增，捐税苛杂，民不聊生，故起义不断，衍生内忧。仅俞大猷平定的农民起义就多达数十起，而每一起动辄数万之众；像古田起义，起起伏伏长达百年，无法绥靖；而在倭寇之中，真倭仅十有二三，附倭却十之七八……在此情形下，镇压与抚化暴动起义者，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的工作，既无法攘外也无法安内。事

实上，明朝就是在北方民族入侵与中原农民起义夹击下崩溃终结的。

三是道德失范。明代“德治”盛极一时，这反而使道德成了伪装、假道学，应演了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之说。从严嵩到一班文官，多是插了道义旗帜的伪君子，他们以弹劾他人来自标高格，对将士用而不信，有功而无赏，有过则严惩，处处制约，使之动辄得咎，“抗倭将帅，从朱纨、王忬、张经、李天宠，到赵文华、胡宗宪，不是被朝廷处死，就是自杀身亡，一个个似乎都没有落得好下场”，他们均系文官参倒。至于武将，在抗倭军事行动中，瓦氏夫人带领佯兵杀倭寇，而官兵作壁上观；俞大猷率军苦战，而广东将官掠功请赏……这样的怪状不胜枚举。因而可以说，明代倭患历百年而不靖，与“德治”失范有重大关系。

《俞大猷传》需要破解的难题是：为何官史“扬戚抑俞”？为何俞大猷在民间口碑不高？曾纪鑫作出了回答：



（戚继光塑像）

这首先是因为俞大猷平定了太多农民起义。虽然俞大猷平暴时多在大兵清除后进行招安抚化,但如果不能发展经济以使百姓安居乐业,那么平民只能再举反旗,如此恶性循环不已;而中国历史上的“平内乱者”,从来都难以留下好口碑。

其次,俞大猷当年在西北抗击的“胡虏”,现在已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再宣扬他这方面的功绩,反而会降低其历史地位。再次,俞大猷毕竟不是一个开国功臣,不算开疆拓土的英雄;他只是一个守成的将领,功绩再高,也只如清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那样做个“裱糊匠”,补漏船,修危楼,忠勇可嘉,却也不过为一姓朝廷多挽了几年纤绳……难能可贵的是,《俞大猷传》在评价历史人物时能抱“同情的理解”,细致考量种族、环境、时代三大因素制约下的英雄心路,而不以今天的标准来求全责备,臧否古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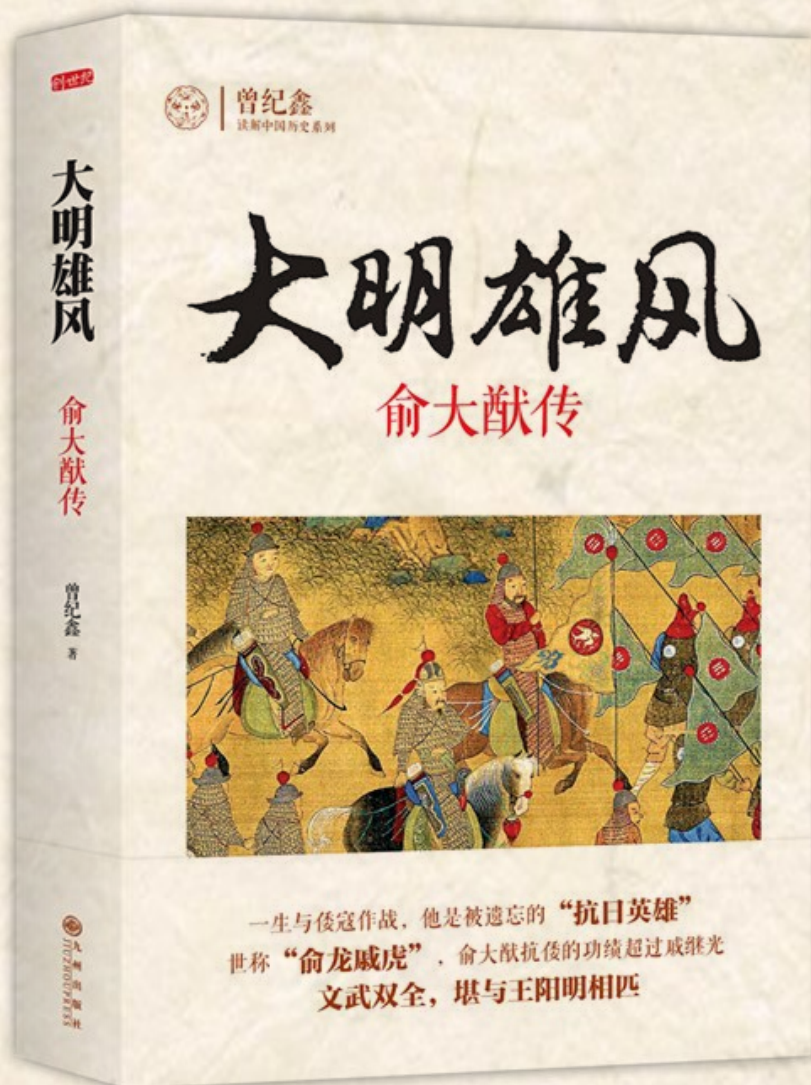
《俞大猷传》虽是“遵命之作”,但曾纪鑫在资料搜求方面,延续了他一贯的“全深细实”作风,仅“附录”中就列举了数百种文集史料、报刊文章和网络资料;他还对一些重要史料进行了对读校勘,行文做到了言而有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故能拨乱反正,纠偏翻案;他甚至提出了创建“俞学”的构想:“俞大猷的哲学、政治、军事思想,国家安全战略,战争指挥艺术,超群绝伦的武功,俞家棍的形成与演变,对闽学的继承与发展,价值取向与人格魅力,以及疏奏、散文、随笔、诗歌、信札等文字,既丰富多彩,又博大精深。特别是军事方面,那超前的战争理论,层层推进的逻辑思维,

立体战略防御方针，兵器的发明与创造，多兵种配合的战争观念，以易布阵、练兵强军、谋定后动、以收全功的用兵之道，讲究截杀、雕剿、大征的作战方式，以及古代少有的数字化管理方式等，足以建立一门新的学问——俞学。”（《俞大猷传》后记）如果有朝一日真有“俞学”成立，那么曾纪鑫功莫大焉！

相关图书：《大明雄风·俞大猷传》

曾纪鑫著

九州出版社2015年9月第1版



简介：

提及抗倭英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戚继光，俞大猷只是作为陪衬而已。其实，在那抗击倭寇的艰难岁月，人言“继光如虎，大猷如龙”，也称“俞龙戚虎”，俞大猷不仅与戚继光并列，甚至还在戚继光之上。龙吟虎啸，雄风猎猎，为由盛转衰的明朝中晚期，注入了一股强悍的活力。

长篇历史人物传记《大明雄风：俞大猷传》还原历史，以丰富的史料、生动的文笔、独到的见解，叙述了俞大猷的生命历程，描写了他转战南北、抗击倭寇、为国效命的不朽功勋，再现了他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人生境界与人格魅力。



蒋天枢：师道的重量

◎ 徐百柯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



（蒋天枢，中国古代文学专家，复旦大学资深教授）

在 近十年来围绕陈寅恪的推崇与传奇当中，
他的受业弟子蒋天枢向人们透出一个清矍
高瘦、若隐若现的身影。

陈寅恪晚年，在病榻上将编定的著作整理出版全权授与蒋天枢，这被后辈学人视为他一生学问事业的“性命之托”。受托之人蒋天枢，作为陈寅恪早年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生，1949年后，十余年间两人只见过两次面。这十余年间，陈寅恪目睹和经历了太多昔日亲密无间的师友亲朋一夜之间反目为仇的事情，但他信赖晚年只有两面之缘的蒋天枢。

蒋天枢值得这种信赖。1958年，他在其《履历表》“主要社会关系”一栏中写道：“陈寅恪，69岁，师生关系，无党派。生平最敬重之师长，常通信问业。此外，

无重大社会关系，朋友很少，多久不通信。”

当年，批判资产阶级史学权威的政治运动正如火如荼，蒋天枢在这种只会带来麻烦而不会有任何好处的“社会关系”中，丝毫不掩饰对陈寅恪的敬重之情，足见其为人之笃忠执着。

他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份重托。晚年，他放弃了自己学术成果的整理，全力校订编辑陈寅恪遗稿，终于在1981年出版了300余万言的《陈寅恪文集》，基本保持了陈寅恪生前所编定的著作原貌，作为附录还出版了他编撰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这大概是“陈寅恪”这个名字在大陆重新浮现之始。



（陈寅恪）

当时出版社给他3000元整理费，他一分钱也没有收，全部退还。因为“学生给老师整理遗稿，怎么可以拿钱呢”。后来，陈寅恪突然“走红”，很多人出来自称是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却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从来没有借陈寅恪以自重。

在陈寅恪托付毕生著作的那几日见面中，一天，蒋天枢如约上门，恰好陈夫人不在，没有人招呼他，已目盲的陈寅恪也不在意，径直开始谈话，结果蒋天枢就一直毕恭毕敬地站在老师床边听着，几个钟头始终没有坐下。那年，他已年过花甲。

接触过蒋天枢的复旦教师说，“程门立雪”这类传统，在蒋先生心中原是稀松平常之事，一个学生总得有他应该躬行的本分。

有人评说，蒋天枢对老师的尊重，出于一种对文化的负载感，而这种负载感正是传自其师门。陈寅恪在《论韩愈》文中就曾说过：“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编撰陈寅恪“事辑”，蒋天枢自己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他的中心意旨是想写出陈先生是“中国历史文化所托命之人”。

蒋天枢出身清华国学研究院，与陈寅恪有师生之谊，并且对自己入学前就已自沉的王国维也严执弟子礼。同行或学生“王国维长王国维短”，即便语气中充满敬意，也会引起他的侧目。在他看来，说“王国维先生”已经大不敬了，何况直呼其名；至于他自己，当然恪守旧例，开口闭口“静安先生”。



(王国维)

同系的名教授朱东润是个性情中人，一次开会，说到得意处随意评了几句“陈寅恪什么什么”，其实未见得有什么不敬之意。还没等在座诸人反应过来，蒋天枢从人群中拔身而起，指着他哼哼了几句，便拂袖而去，只留下朱先生哭笑不得地摊摊手，连声“啧啧”，十足的难堪。

如今复旦中文系的名教授章培恒是蒋天枢的弟子，除了做学问，他显然还受了先生关于“尊师”的教诲。一次，他随蒋先生外出办事，晚上完事后照例送老师回家。途中下了场大雨，车到教师宿舍大门，遍地积水，而蒋先生脚上穿的却是家常的布鞋。章先生提议

要背蒋先生，全然不考虑自己也已直逼花甲了，蒋先生自然坚拒了。于是，老师蒋天枢跨出车门，洒脱地直奔寓所，学生章培恒脱下皮鞋，一手拎着，在雨中着一双白袜跟在老师身后。

蒋天枢在1979年为《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所写的“题识”中说：“余欲纂‘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已数年，悠忽蹉跎，今乃得从事辑录，距先生之逝世已将10周年，余亦老矣。”1997年，此书增订再版，章培恒在“后记”中引用了这段文字，随后心有戚戚然：“现在，距离蒋先生的逝世也已将近10周年，而我也已经老了。”

这些都不是虚辞，字里行间，透出师道的重量，后人读来，满页沉甸甸的。先生们都已经老了、逝去，师道传承，今日焉在？

本文选摘自《民国风度》

徐百柯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简介：

本书为《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最佳专栏——“钩沉”结集，其专栏主笔徐百柯从故纸堆里或人们的记忆中，钩起79个人物。这些人物有些是我们些许熟悉的，还有一些人物，徐百柯如果不写，恐怕将会被时间或时代彻底湮没与忘记。

他们是故去的名校校长，文章报国的报人，埋头学问、以学术报国为天职的知识分子，以及在世界面前代表中国的外交家、金融界的精英、马上赋诗的将军……他们是梅贻琦、蒋南翔、张季鸾、胡政之、刘文典、杨荫榆、陈西滢、梅汝璈、顾维钧、卢作孚、陈望道、蒋百里……

围绕着一幕幕鲜为人知的传奇秩事，通过本书在历史零散与完整的记忆中生动再现。他们曾经的理想，他们的面容和言行，他们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在徐百柯的文字中一一复活。



林语堂与鲁迅

◎ 周质平

林语堂所向往的是传统中国文人精致典雅悠闲的生活，这与鲁迅此时所热衷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不同调的……



1981年，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16卷本的《鲁迅全集》中，提到林语堂的地方不少。对林语堂的官方论断是这样的：

三十年代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刊物，提倡性灵，幽默，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为国民党反动统治者粉饰太平。1936居留美国，1966年定居台湾，长期从事反动文化活动。

这短短的一段话，可以视为1949年之后，共产党对林语堂的定评。其实林语堂一生除了1927年曾短期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以外，没有参与过政府的工作，1936年之后，长期居留海外，主要以英文发表著作，很少具体地评论国内事务。究竟是什么原因共产党给以如此的酷评呢？这还需从林语堂与鲁迅的一段交往谈起。



[1933年2月17日鲁迅与宋庆龄、萧伯纳等摄于上海宋宅的合影（左起：史沫特莱、萧伯纳、宋庆龄、蔡元培、伊罗生、林语堂、鲁迅）]

1932年－1935年是林语堂在中国最活跃，影响最大的几年，他所主编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三本杂志，畅销一时，“幽默”，“闲适”成了一时风尚。由于林语堂、周作人等人以晚明小品作为文章典范，许多在清代遭到禁毁的明人集子，重新受到三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注意。

林语堂在1934年出版了包括《袁中郎全集》在内的《有不为斋丛书》，这些重刊的书籍，都是明末清初“专抒性灵”的作品。但与此同时的是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的兴起，大力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由此引发了鲁迅与梁实秋之间“文学有没有阶级性”的辩论。林语堂在这次论战中，虽未直接参与，但显然较同情梁实秋，文学并无阶级性的说法。

林语堂所向往的是传统中国文人精致典雅悠闲的生活，这与鲁迅此时所热衷的无产阶级文学是不同调的。这一点在他的名著《生活的艺术》中，表现得最

为清楚，晚明文人袁宏道、张岱的山水小品，明末清初李渔的《闲情偶寄》，张潮的《幽梦影》，都受到林语堂高度的欣赏和评价，其中许多片断收入《生活的艺术》一书中。



（沉醉在音乐中的林语堂）

从五四到三十年代，那一代的作家中，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大多强调中国的苦难，列强的欺凌，礼教的束缚，继而要同胞们奋发，努力，改革不合理的制度。

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章，鲁迅的短篇小说，胡适的社会评论可以说无一例外。林语堂是少数在那个苦难的时代里，敢于提倡生活的情趣，并带着相当享乐主义的色彩，提出“快乐无罪”的看法。也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鲁迅说“[林语堂]所提倡的东西，我是常常反对的”。

1933年6月20日，鲁迅有信给林语堂，对《论语》的作风，已经不甚满意，但语气还是平和的：

顷奉到来札并稿。前函令打油，至今未有，盖打油亦须能有打油之心情，而今何如者。重重压迫，令人已不能喘气，除呻吟叫号而外，能有他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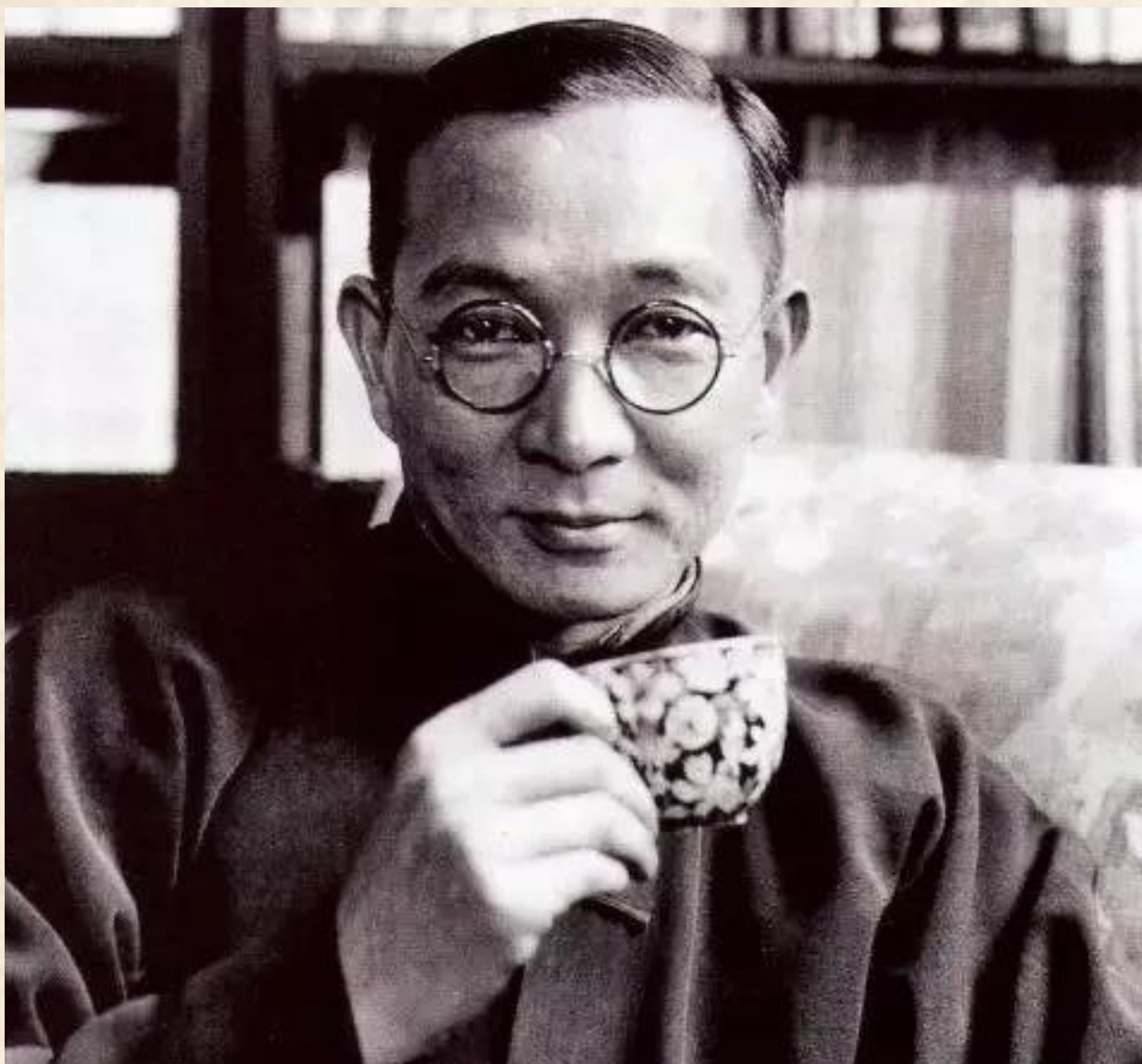
不准人开一开口，则《论语》虽专谈虫二，恐亦难，盖虫二亦有谈得讨厌与否之别也。天王已无一枝笔，仅有手枪，则凡执笔人，自属全是眼中之钉，难乎免于今之世矣。

据《鲁迅全集》注，“虫二”是“风月”两字去其边，因此，“虫二”，亦即“风月无边”之意。所谓“天王”，指的是“国民党”。

林语堂何尝不知，九一八之后，中国真是到了存亡的关头，何尝不知“重重压迫，已不能令人喘气”。他之所以在此时写打油，谈风月，正是要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之下，为中国人提供一处政治上比较中立的空间，在那方园地里，也还能喘喘气，还能在“呻吟叫号”之外，有些微吟低唱。他在《有不为斋丛书序》中，很风趣地说明了这样的心情：

难道国势阽危，就可不吃饭撒尿吗？难道一天哄哄，口沫喷人始见得出来志士仁人之面目吗？恐怕人不是这样的一个动物吧。人之神经总是一张一弛，不许撒尿，膀胱终必爆裂，不许抽烟，肝气终要郁结，

不许讽刺，神经总要麻木，难道以郁结的脏腑及麻木的神经，抗日尚抗得来吗？



（林语堂）

林语堂曾说，要做文人，须先做人，同理，要做一个爱国的人，也必须先做人。没有一个连人都做不好的人，而能做好一个文人，或一个爱国的人。林语堂拒绝依附党派，拒绝卷入政治斗争，并不是不关心政治，不关怀社会。在他看来，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扮演的角色，不是顾问，而是质疑者。一旦成了顾问，也就是所谓国师，那就免不了得为当道谋划献策，林语堂为中国的将来既没有画过蓝图，也没有指出过方向，

也没有鲁迅要用文学来为中国人治病的雄心。

1933年，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把林语堂所提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比作文人雅士案头的清供和书房中的小摆设，指出提倡者的用心是想“靠着低诉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鲁迅的这一论调，后来成了共产党对林语堂官方“定评”的底本。鲁迅认为，当时中国所需要的是“匕首和投枪，要锋利而切实，用不着什么雅”，而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则缺“挣扎和战斗”的精神和内容。全文的总结是：

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

鲁迅在1933年到1935年之间，曾多次撰文或指名，或暗讽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如1933年的《“滑稽”例解》，1935年的《论俗人应避雅人》，都是针对林语堂而发。



(鲁迅)

1935年,《宇宙风》首刊,林语堂在《且说本刊》一文中,提出了他对当时文坛的观察和批评,与鲁迅的说法有针锋相对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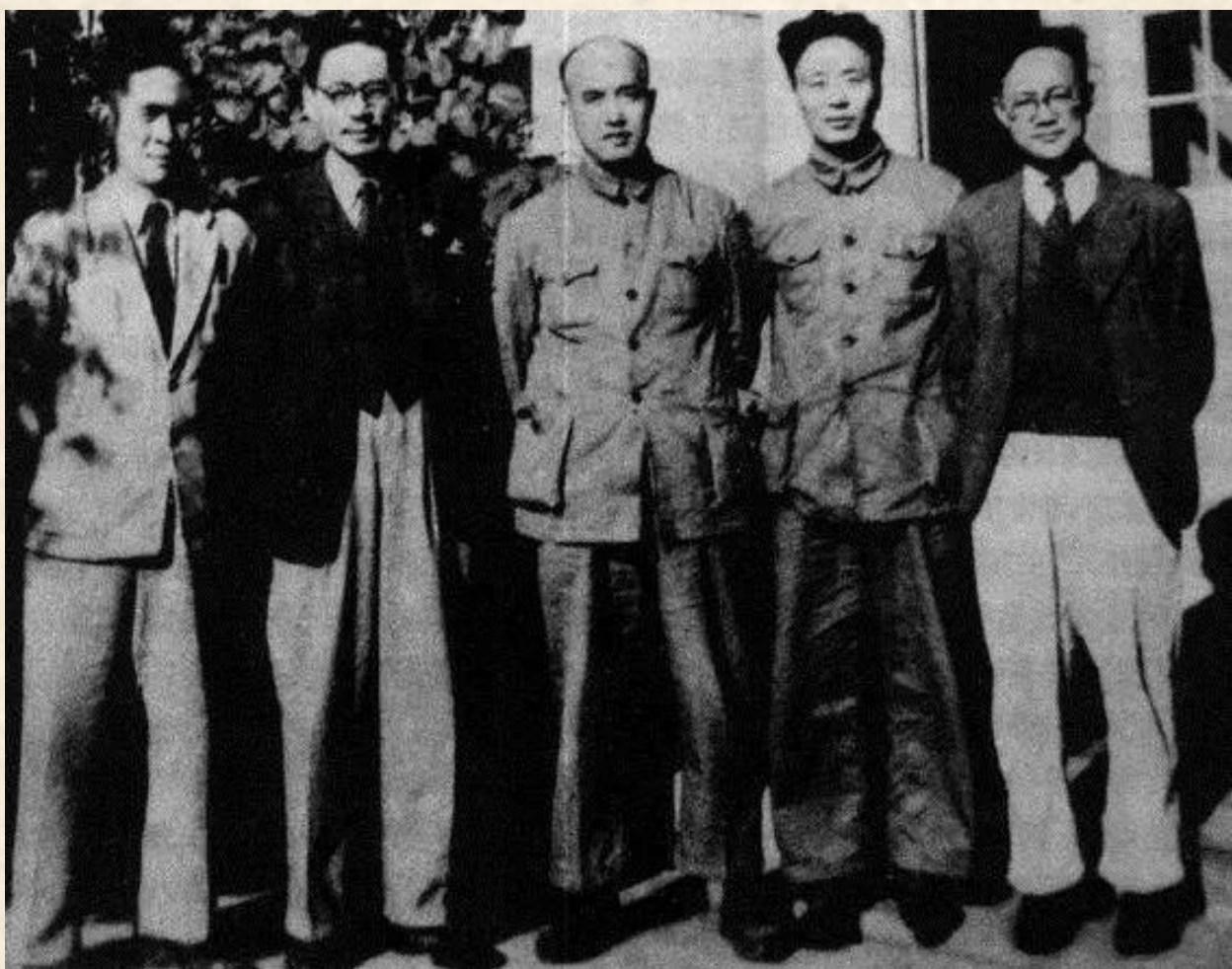
吾人不幸,一承理学道统之遗毒,再中文学即宣传之遗毒,说者必欲剥夺文学之闲情逸致,使文学成为政治之附庸而后称快,凡有写作,猪肉熏人,方巾作祟,开口主义,闭口立场,令人坐卧不安,举措皆非。

这段话说出了林语堂与左派文人之间,对文学功能根本不同的看法。在林语堂看来,文学除了为作者自己服务以外,没有其他服务的对象。

他经常拿晚明袁宏道所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作为写作的原则。“独抒性灵”是就内容言,亦即文学的功能只是在抒发作者的情性,哀乐,癖好。至于是否有益世道人心,能否劝世救国,以至于为无产阶级服务,都与文学不相干。“不拘格套”则是就形式言,好的作品

必须在形式上有充分的自由。所以他说“文学亦有不
必做政治的丫环之时”。

这番话当然也是响应胡风在1934年发表的《林语堂论》，胡风对林语堂从20年代《剪拂集》的“凌厉风发”，退居到了30年代的“幽默闲适”，不但深致惋惜，并有严厉的批评，认为林语堂所提倡表现“个性”的小品，是脱离实际，缺乏社会关怀。而林语堂所谓的“个性”，“既没有一定的社会土壤，又不受一定的社会限制，渺渺茫茫，从屈原到袁中郎都没有分别”。



[1949年，胡风（中）与马思聪（左一）、
史东山（左二）、艾青（右二）和巴金（右一）]

在林语堂看来，屈原和袁中郎虽然在时间上有近两千年的距离，一个生在战国，一个生在明末，但文学是反映作家个性的这一点，却是共通的。胡风则认为

文学不只是反映作家的个性,也必须是社会的一面镜子,起一种改造社会的作用。

林语堂在《翦拂集》的序里,对自己由凌厉风发一变而为幽默闲适,作了一定的交代,亦即在不可有为的时代,宁可有所不为,以“有不为”名其斋,取意正在此。有所不为,还可以保持一定的独立和人格,在不可有为的时代,而企图有所作为,则不免沦为政治的宣传。加入“左联”以后的鲁迅不正是如此吗?鲁迅在死前一年,写信给胡风,说到萧军应不应该加入“左联”的事。他直截了当地回答道:

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最初的事,说起来话长了,不论它;就是近几年,我觉得还是在外围的人们里,出了几个新作家,有一些新鲜成绩,一到里面去,即酱在无聊的纠纷中,无声无息。

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么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的说,我做得好极了……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

连鲁迅进入“左联”之后都觉得身不由己,更不要说其他身份地位不如鲁迅的作家了,一旦加入了“左联”,整个人就成了政治的工具。林语堂在写作中始

终要保持他的独立和自由，拒绝成为任何人、任何主义、任何教条的工具。

林语堂曾以“寄沉痛于悠闲”论周作人诗，也许我们可以说林语堂的小品文“悠闲有余，沉痛不足”，或甚至于“但有悠闲，而无沉痛”，但这一点在林语堂看来，并不足为病。

三十年代，在“左联”无产阶级文学的狂澜之下，几乎成了只要是文学就必须“沉痛”的局面，林语堂在此时，敢于站出来说，“沉痛”固然是文学，“沉醉”也未尝不是文学。一个作家在“沉痛”之余，也有“沉醉”的权利。这样的看法，与其说是他跟不上时代，不如说是时代跟不上他。

我在《林语堂与小品文》一文中曾经指出：林语堂在三十年代，国难深重的时刻，提倡写幽默闲适的小品，他的精义还是在争取言论自由。“他所一再强调，一再表明的是：即使国难当前，我有不谈救国的自由；即使国难当前，我还要有做我自己的自由。”

鲁迅发表《小品文的危机》之后，梁实秋曾为文声援林语堂，1933年10月21日，梁在天津《益世报文学周刊》，发表了《小品文》一文，指出鲁迅太过“霸道”，小品文应该允许有不同的风格，并不千篇一律地“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即使有些小摆设，也不致消磨青年的革命志气。

鲁迅批评《论语》《人间世》的小品文确有太过“霸道”的地方，但他指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究竟不是晚明，在当时提倡明季山人墨客的生活，不免

有效颦学步之讥。这一点确实道出了林语堂在三十年代提倡幽默闲适的病痛所在。鲁迅在1934年6月2日,给郑振铎的一封信里写道:

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之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而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

其实文人作文,农人掘锄,本是平平常常,若照像之际,文人偏要装作粗人,玩什么“荷锄带笠图”,农夫则在柳下捧一本书,装作“深柳读书图”之类,就要令人肉麻。现已非晋,或明,而《论语》及《人间世》作者,必欲作飘逸闲放语,此其所以难也。

闲适幽默,讲究生活情趣,是一种心境,一种态度,不可时时挂在笔端口头。在生活细节上努力做出闲适风雅,唯恐落入俗套,结果却不免成了“一说便俗”的尴尬处境。雅人自有深致,不需时时说出。鲁迅发表《论俗人应避雅人》,取意也正在此。

林语堂以晚明文人的作品和生活形态,来作为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某种典型,一方面如鲁迅所说,忽略了时代的不同,九一八以后的中国毕竟不是万历后期的明代;另一方面,明季的山人墨客,表面上,风雅自适,而实际上,有许多欺世盗名之徒,风雅闲适只是幌子,争名夺利毫不多让。

山人名士,特盛于明季,沈德符(1578 - 1642,字

景倩)在《万历野获编》中,特立《山人》一节,可以看出山人在当时泛滥堕落的一般:“此辈率多儇巧,善迎旨意,其曲体善承,有倚门断袖所不逮者。”

林语堂在文章中经常提到的陈继儒(1558 - 1639,字仲醇,号眉公),自称“山人”,而实周旋于官绅之间,以此而名利兼收。蒋士铨(1725 - 1785,字心余)在《临川梦》一剧中讥评陈继儒“装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著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这说的虽是陈继儒,也实是晚明山人的众生相。林语堂在推崇袁宏道、陈继儒这批晚明文人的时候,多少也助长了一些附庸风雅的虚骄之气。

小品文是晚明那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反映的是16、17世纪中国部分文人墨客的生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既没有晚明的生活,更没有晚明的社会,在九一八之后,提倡写晚明小品,这又何尝不是林语堂经常讥讽的假古董呢?

1934年8月13日,鲁迅在给曹聚仁的一封信中,提到他曾建议林语堂少写小品,多作一些翻译,或许更能有益于中国:

语堂是我的老朋友,我应以朋友待之,当《人间世》还未出世,《论语》已很无聊时,曾经竭了我的诚意,写一封信,劝他放弃这玩意儿,我并不主张他去革命,拼死,只劝他译些英国文学名著,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译本于今有用,在将来恐怕也有用的。

他回我的信是说,这些事等他老了再说。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看近来的《论语》之类,语堂在牛角尖里,虽愤愤不平,却更钻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来的。



(鲁迅、许广平、周作人与孙伏园等合影)

在鲁迅看来,林语堂的小品是“无聊的玩意儿”,于中国无益,也无法存留下来。有益无益,我们无法确知,但七八十年过去了,林语堂的作品还在继续重印,却是事实。

当然,七八十年在历史上只是一瞬,语堂小品,能否传之后世,而今言之过早,即使鲁迅的作品是否能

够不朽，也还未知。但有一点，鲁迅是对的，林语堂没有变得更急进。至于说钻牛角尖是林语堂自己也承认的。他在《我的话·序》中说：

信手拈来，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谈，颇有走入牛角尖之势，真是微乎其微，去经世文章远矣。所自寄者，心头因此轻松许多，想至少这牛角尖是自己的世界，未必有人要来统治，遂亦安之。孔子曰：汝安则为之。我既安矣，故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鲁迅用“牛角尖”似有贬义，而林语堂则坦承不讳，并以钻牛角尖而自命，自乐。

1936年10月19日，鲁迅死在上海，时林语堂在纽约，13个月之后，林语堂发表《鲁迅之死》，悼念这位老朋友，对他们两人的交谊离合，作了回顾和分析。讲到有关小品文的那段争执，林语堂是这么说的：

《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向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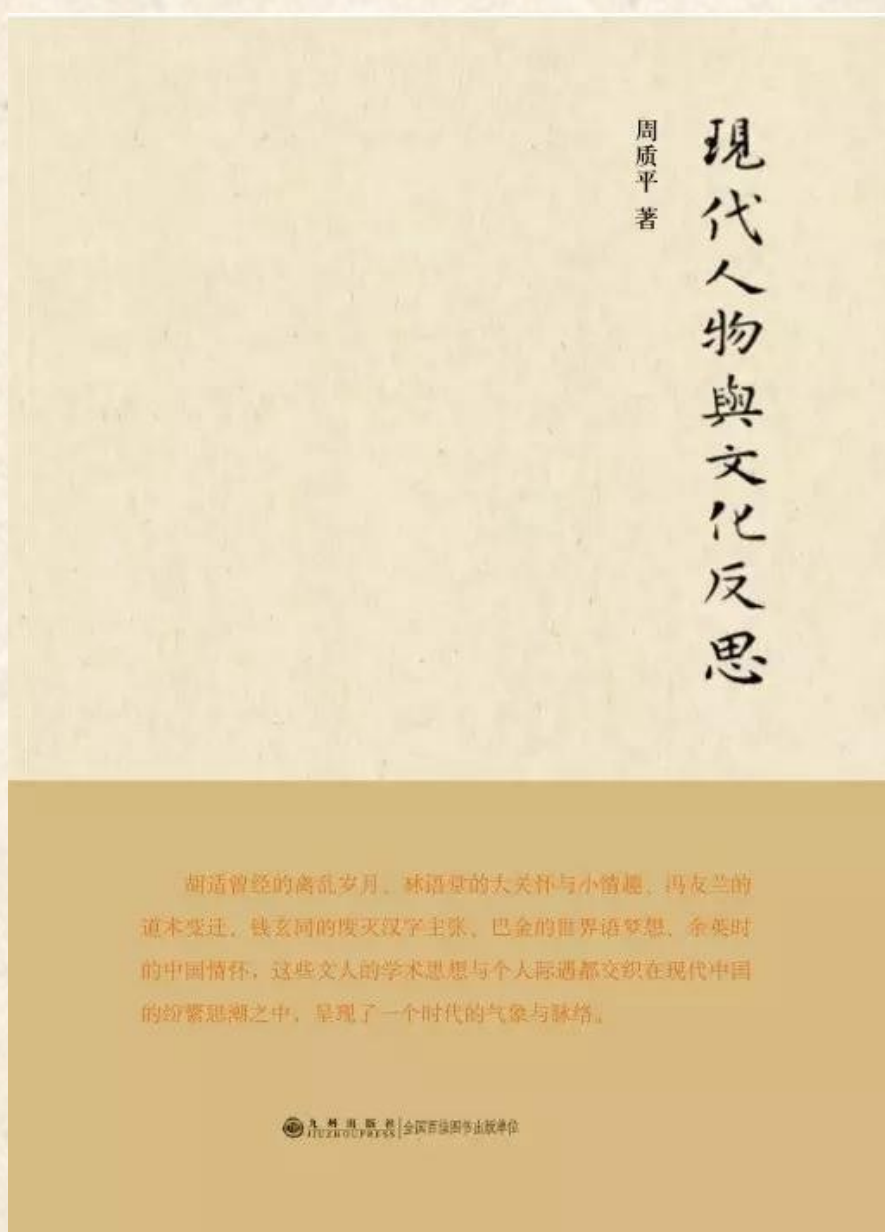
林语堂和鲁迅之交恶，全在“党见”二字。林语堂所提倡的小品文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一点，正是

“个人笔调及性灵文学之命脉”所在。林语堂的小品文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之所以有一席之地，正在他能独树一帜，而没有随着左派俯仰。这点缺乏党见，在共产党官方的评论看来，自然是一种遗憾，但就客观的立场而论，则正是林语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国文坛的贡献。

选摘自《现代人物与文化反思》

周质平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简介：

本书收录了周质平先生多年来有关现代学人与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共分三个部分。人物研究中涵盖了胡适、林语堂、赵元任、余英时等现当代学术史上的重要学者，论述着重在思想史层面的分析。

语文发展的内容，重点关注现代中国汉字命运的探讨以及简化字、世界语等话题，对百年来的语文发展提出独特的见解。随笔杂文部分，汇集了作者近20年来文化反思方面的文章，内容精练，论断清晰，为读者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何为谋生之道

◎ 克里希那穆提

放弃世俗的财富、舒适和地位还相对容易些；
但是放弃要当什么、要成为什么的渴望却需要
极大的智慧和悟性……

《生命的注释》



放弃世俗的财富、舒适和地位还相对容易些；但是放弃要当什么、要成为什么的渴望却需要极大的智慧和悟性。财富所赋予的力量，就像天分和才干所赋予的力量一样，是认清真相的障碍。

《关系之镜》



欲望是一种能量，需要去了悟，不能仅仅压制它或屈从于它。任何试图强迫或压抑欲望的努力都会带来冲突，钝化感觉。如果你彻底摧毁欲望，你就破坏了自己的敏感和集中的意念。

《谋生之道》



只要你用心,你就会发现自己可以在这个丑陋的世界上——我用“丑陋”是指字典上的意义,不持有感情的意义——工作、做事,但大脑依然清醒,像河流一样,永远在净化自己。

《爱与寂寞》



在看到夕阳的时刻，你并没有快乐，你只是看见绝妙的事物，满是光芒、色彩和深度。当你离开回到你的生活中，你的思想说：“那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我希望能再有这种经验。”所以，是思想让快乐永存不朽。

《生活的难题》



你和我才是问题，而不是这个世界，因为世界只是我们自身的投射物，想要了解世界，我们就必须先要了解我们自己。世界不是脱离我们而存在的，我们就是世界，我们的问题便是世界的问题。

《关系的真谛》



如果仔细观察生活，仔细观察与他人的交往，我们发现生活实际是一个心生隔膜的过程。我们并非真正关心彼此，尽管这两个字常被挂在嘴边。只有交往让我们心生感激，给我们提供庇护，令我们舒适满意，我们才承认与某人有交情，一旦感觉不安或不舒服，交往便立刻中断。换句话说，只有感觉满意，交往才可能继续。

相关图书：《克里希那穆提全集》

克里希那穆提著



简介：

克里希那穆提，享誉世界的心灵导师，美国《时代周刊》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五大圣者之一”。他一生的教诲旨在帮助人类从恐惧和迷茫中解脱，体悟慈悲与至乐的境界。

克里希那穆提一直对世人讲话，直到1986年过世，享年90岁。他的言论、日记、书简集结成60册以上的著作。这一套丛书就是从他浩瀚的言论中撷取出来，每一本都讨论了一个和日常生活特别有关而又重要的题目。

扫描下方二维码，阅读更多相关内容





主办:九州出版社

出刊:廿四节气,逢节气出刊

文字校审:@沧桑

数字出版:@朱国政

排版制作:@王浩鹏

文稿整理:@冯冯

统筹:@一木

【往期下载地址】



Copyright ©2015年

九州出版社《读·享|九州》

微信订阅号:jzhpress

Email:duxiangtuan@jiuzhoupress.com(投稿、入会)

企鹅:2635599399

秋分

